“学术尚未替”与吴澄的时代意义

邱江宁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元朝是中华传统历史上，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多族群交融特征极为突出的大一统王朝。吴澄所处的时期，正是蒙古统治阶层努力立足中原，推进与汉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虽然出仕较晚，吴澄却凭借时代际遇，出入通都大邑，竭尽平生之所学，著书立教。吴澄学高且寿长，一生致力于“恢宏至道，润色鸿业”，在他的作用和影响下，天下多族群的学者四面而归之，不仅使其学术思想得以廓清，传远及深，更使得以“朱陆和会”为主要面貌的程朱理学成为元代学者之依归，最终令有元一代“斯文未丧”而学术未替。

关键词：学术尚未替；吴澄；元代；思想领域；多族群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1-0104-10

收稿日期：2024-11-18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课题（编号：2063）：吴澄年谱长编。

作者简介：邱江宁（1973-），女，江西南城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1.014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号草庐，临川郡崇仁县人，人称“草庐先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出任国子监丞。至治三年（1323），任翰林学士。泰定元年（1324），首任经筵讲官，1325年，参与修纂《英宗实录》。卒赠江西行省左丞，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一生著述颇巨，合为《吴文正集》100卷。综合元朝官评及时调，吴澄之于元代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的意义，如元代奎章阁大学士虞集所谓“惟皇上帝，未丧斯文。笃生先生，在我圣元”①，虞集认为，元代斯文未丧，是因为有吴澄的出现，这是天佑元朝学者的重要体现。

现有的传统学术思想史体系中，人们惯称宋明理学，不仅略过了与两宋并存的辽、夏、金，且很自然地跨过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元朝，或将元朝思想发展进程仅视作“南宋哲学之余烬而已”。② 但是，在《宋元学案》中，黄宗羲关于元代学术的评价云：“有元立国，无可称者，惟学术尚未替，上虽贱之，下自趋之，是则洛、闽之沾溉者宏也”。③ 作为汉人学者，又身处明清易代的时局中，黄宗羲认为元代本没有任何值得称道之处，但站在学术思想史的立场，黄宗羲认为元代学术并没有因为时代而堙没废弃。尽管上层统治者不能重视学术，但在下的士大夫却道心不止，奔流趋之，以至于元代的程朱理学沾溉宏远，黄宗羲的评价意味深长且令人寻味。相比之前的时代，元朝的大一统时代特征格外突出。自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渤海、女真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在元朝区划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族群圈层，所涵盖的人群有“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汉人八种”，“金人三十一种”④，元朝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多元族群大交融的一统王朝，而这正是“整合元代政治思想史学科资源、规训元代政治思想史的边界和准则的重要前提”⑤。基于元朝多族群共存的社会现状，黄宗羲所揭示的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家“学术尚未替”的情形才显得尤其可贵。这其中，吴澄所具有的意义典型且值得关注。

①[元]虞集：《祭吴先生伯清文》，王颋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3页。

②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27页。

③[清]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页。

④[元]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12-14页。

⑤史卫民：《元代政治思想史》“序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页。

一、“学术尚未替”的时代大背景

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哲学史或思想史体系中，类如吕思勉的《理学纲要》、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基本上“无元代理学的一席之地”，[①]吴澄作为元代理学家，自然被忽略，这并非吴澄本人的成就问题，而是吴澄所处的时代——元朝的问题。但是程朱理学是在元朝才开始成为官学，这个标志性的进程推动了元代理学的发展，这是黄宗羲给予元代“学术尚未替”说法的现实基础，同时这还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元朝的理学发展样貌。

与之前的王朝相比，元朝疆域乃开辟以来最辽阔的朝代，由此带来的“异服怪形”现象也是“开辟以来之所未见”。[②] 而与之前大一统时代具有的“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特征颇为不同的是，元朝社会“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整个社会“睢盱万状，有目者之所未尝睹；咿嗢九译，有耳者之所未尝闻”。[③] 入主中原之前，蒙古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也不使用文字表达：“鞑人本无字书……虽无字书，自可立国”，[④]“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⑤]更特出的情形还在于，蒙古人与中原文化接触较为稀疏，在元廷之上“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趣向之不同”[⑥]，所以陈垣指出，在元朝的话语权结构中，“百汉人之言，不如一西域人之言”[⑦]，儒家思想在元朝并不像之前的中原王朝那样具有独尊的地位优势。在这样的时代情境下，立足于汉文化中心视角的黄宗羲尤且认为元朝虽诸事皆无足称道，唯独“学术尚未替”，并认为元代“洛、闽之学”竟然能在“上虽贱之”的背景中，做到“下自趋之”，最终广泛浸润有元一代的学者，[⑧]可堪浩叹。

黄宗羲对于元朝思想史发展情形的观察与评价非常独特，但似乎又提出了一个悖论，何以“上虽贱之”，而“下自趋之”？如果没有在上者的推动与鼓励，在下者何来“趋之”的动力呢？史卫民在《元代政治思想史》中认为，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在草原帝国与农耕王朝统治思想的博弈过程中，“附会汉法”的潮流占据上风，蒙古统治阶层在汉人精英的帮助下，“祖述变通”，努力推行中原王朝运行的政策、制度，加强“文治”，使天下一新。史先生的这一评述非常到位。具体呈现这个博弈结果的典型事件是，1260 年，在汉人精英的推举和拥戴下，忽必烈宣布即位为大汗，并颁布由王鹗拟写的《即位诏》。诏书表述云：

>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⑨]

这道诏书的颁布，标志着蒙古政权的国家本位和统治政策的重大变化，草原本位的大蒙古国开始向汉地本位的元王朝转变。[⑩]忽必烈通过汉人的口吻向天下人宣谕，元王朝祖述变通，努力改变此前凭借武力征服世界的行为方式，致力于文治，也期望得到汉地民众的支持，同心协力，共兴天下大业。蒙古统治者的“变通”速度也堪称雷厉风行。《即位诏》颁布的次年，中统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政府下诏要求全国岁时祭

---

①邱树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元史研究》，《史学月刊》2003 年第 5 期。

②[元]吴澄：《题梁湘东王绎贡职图后》，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年，第 14 册，第 546 页。

③[元]吴澄：《送萧九成北上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14 册，第 115 页。

④[南宋]彭大雅、徐霆著，许全胜校注：《黑鞑事略校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61 页。

⑤[南宋]赵珙著，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三辑，呼和浩特：1985 年，第 5 页。

⑥[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1 册，第 178 页。

⑦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29 页。

⑧[清]黄宗羲著：《宋元学案》卷首，第 17 页。

⑨[明]宋濂等：《元史》卷四《世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 册，第 64-65 页。

⑩陈高华：《元代文化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152、153 页。

孔，“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①]并且规定“诸官员、使臣、军马，无得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管工匠不得于其中营造，违者严行治罪。管内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搔扰”。[②] 不仅如此，中统二年(1261年)，政府还设置“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③]凡“郡若州邑，莫不有学，学莫不有官”，[④]其学校与学官增设之广，较之以倡导文化与学术而著称的宋朝，弥不有加。

需要指出的是，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对于儒家思想非常陌生。虞集曾感慨云“国朝以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术进者”，比较委婉地说，蒙古人建立元朝之前，只依凭武力征服天下，鲜有以儒术靠近蒙古贵族者。蒙古语也从未全面通行于中原区域。因此，蒙古人“亦未始知有经传之学也”。[⑤] 而忽必烈所以能在称汗之后，迅速转变统治思路，又得益于金源文人对忽必烈等蒙古贵族的儒家思想灌输。金源儒士赵璧“始以国语译《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忽必烈及“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⑥]到许衡任元朝第一任国子监祭酒，率其弟子对蒙古、色目贵族进行近身教育，“躬行以表帅之，设法以教养之”，终令这些“大而宰辅卿士，小则郡牧邑令”的蒙古、色目子弟在视听专一的背景下，“变化气质”，成德达才。[⑦]在许衡的影响下，朱子之学大行海内，家习其书，[⑧]整个国家“学术正，人心一，不为邪论曲学所胜”。[⑨]更值得注意的是，元朝“自京师通都大府，至于海表穷乡下邑”，学校所授圣贤、群经、四书之说，皆“自朱子折衷论定”，于是“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⑩]王瑞来在《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中比较宋、元士大夫的出路指出，尽管南宋登科者51000人，但其背后却隐含着150年间将近五千万人次落第孙山的惨酷现实。宋元变革，虽然“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⑪]的表述并不真实，但元代在全国各地建书院学校四万余所，使得南宋培养的广大士人群体被迫或主动地走出中原文化的主体区域，走向蒙古人所统辖的广大区域，从边关塞漠到白山黑水甚至雪域高原，不仅最大程度纾解了南宋的阶层结构性矛盾，而且深度形塑了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的走向。[⑫]

另外，更须提到的是，传统学术界普遍诟病的元朝科举考试。延祐二年(1315)，元廷开启首届科举考试，这个时间距离大蒙古汗国建立的1205年，约110年，距离忽必烈称汗的1260年，约55年，距离南宋灭亡、元朝形成大一统王朝的1279年，约36年。元朝科举考试制定程式如下：

>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 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⑬]

根据所引程式内容，不仅程朱理学被定为考试核心内容，而且考试所面对的对象是包括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内的元朝所有族群士子。作为延祐首科取得第一名的色目人，马祖常曾叙述当时色目子弟科考情形道：“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百五十人。或朔方、于闐、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问于有司，于时可谓盛矣。”[⑭]科举考试视“程朱理学”为官学的政策，不仅有效地推动了蒙古、

---

①[明]宋濂等：《元史》卷七六《祭祀志》，第6册，第1901页。

②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86页。

③⑬[明]宋濂等：《元史》卷八一《选举志》，第8册，第2032页，第2019页。

④[元]许有壬：《庆州书院记》，《全元文》，第38册，第196页。

⑤⑥[元]虞集：《中书平章政事赵璧政谥文忠议》，王颋点校：《虞集全集》，上册，第372-373页，第373页。

⑦⑧[元]苏天爵：《元故翰林侍读学士赠陕西行省参政知事吕文穆公神道碑铭》，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七，中华书局，1997年，第93页，第96页。

⑨[元]苏天爵：《左丞许文正公》，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79页。

⑩[元]虞集：《考亭书院重建朱文公祠堂记》，王颋点校：《虞集全集》，上册，第658页。

⑪[元]伯颜：《奉使收江南》，杨镰主编：《全元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册，第110页。

⑫黄博：《宋元变革论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读书》2024年第3期。

⑭[元]马祖常：《送李公敏之官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2册，第403页。

色目群体的汉化进程，更极大地推动和刺激了南北多族人群研习程朱理学的热情，使元代的“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而凡是程朱理学著作畅行之处，也可谓其学说传播之所，这亦相当程度地意味着“道之所行”及于天下也。①

综上所述，尽管元朝作为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多族群大一统王朝，本来没有中原儒家思想的基础，但基于时代变革和蒙古贵族统治管理一统王朝的诉求，元朝社会祖述变通，颇有文治举措，而吴澄即活动于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中，得以竭尽平生之所能，著述立教，“恢宏至道，润色鸿业”，终使元代“斯文未丧”而“景运方兴”②，从而令民族观念极强的黄宗羲慨叹元朝“学术尚未替”。

二、吴澄的时代际遇与元代“朱陆和会”的儒学思想面貌

综观元代文化和思想领域，《宋元学案》将其厘分为四大家，曰：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师山郑玉，刘因、郑玉两家沉沦地方，影响不能与许、吴二氏相伯仲。揭傒斯在为吴澄撰写的神道碑中，比较许衡与吴澄之于整个元代士人及思想界的意义后，认为：许衡之为学为教，力主笃实以化人，言传而身教，在元王朝开国之初，面对那些不同于中原文化的蒙古和色目贵胄子弟，许衡“得早以圣贤之学佐圣天子开万世无穷之基”，具有启蒙意义，“故其用也弘”；而吴澄得大用于元朝大一统后之天下，虽然登仕较晚，其为学为教“主于著作以立教”，③在他的作用和影响下，“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不仅“其学远而彰、尊而明”，④而且“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实”，比起许衡，吴澄的影响“其及也深”。⑤

吴澄及其引领的草庐文人群体，诸如程钜夫、虞集、危素、周伯琦、范梈、元明善、贡奎、陈旅、王守诚、苏天爵等代表人物，他们在元朝统治阶层融入中原、“祖述变通”的进程中，多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⑥这使得吴澄本人的过人志向、才华与罕见的人生际遇相互成就，也如揭傒斯所概述，比起那些“居万山间，与木石为伍，不出门户”的优秀学者，“吴先生多居通都大邑，又数登用于朝，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故其学远而彰、尊而明”，⑦而且吴澄学高而寿长，又“主于著作以立教”。⑧所以，元代的儒学面貌深受吴澄的思想影响，需要将他的人生历程与时代的变化进程，以互文互训的方式结合起来理解。

如前所揭，初入中原的忽必烈统治集团在中统元年(1260)通过即位诏向汉人表达融入中原的期待，并热忱呼唤豪杰之士“献可替否之助”，同心协力，共兴一统大业。这个时间的吴澄，中统二年(1261)，13岁时“大肆力于群书”，⑨中统四年(1263)，15岁时“遂以圣人之学自任”，至元四年(1269)，19岁的吴澄著《道统图并叙》，以接续一代道统为己任：

> 朱子没，至今逮将百年矣，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今世之儒，所学者果何学也？要不过工时文，猎科第，取温饱而已。……澄生十有九年矣……慨然以豪杰之士自期，必欲为周、程、张、邵、朱，而又推此道，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也。⑩

年轻的吴澄在这段话中很豪迈地指出，自1200年朱熹去世后，70年间，虽然儒学学者辈出，但他们只为求温饱而致力于工时文、猎科第，并没有绍续朱子之道统的志向和努力。而他本人，却以豪杰之士自期，将人生目标设定为，务必使道统继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等人之后得到传播和接续。吴澄的老师程若庸也对他的能力与努力给予高度肯定，曾云“未见年方逾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

---

①[元]虞集：《(建阳县)考亭书院重建朱文公祠堂记》，王颋点校：《虞集全集》，上册，第658页。

②③⑤⑧[元]揭傒斯：《大元敕赐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吴公神道碑》，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辑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06页，第538页，第538页，第538页。

④[元]揭傒斯：《定宇陈先生栎墓志铭》，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辑遗》，第556页。

⑥邱江宁：《元代草庐文人与他们的文学时代》，《武汉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⑦[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28页。

⑨[元]虞集：《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7册，第169页。

⑩[元] 吴澄：《谒赵判簿书》，方旭东、光洁点校：《吴澄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4册，第2027-2028页。

昼方旦，何可量也?”[①]不仅肯定青年吴澄的学术见地，更肯定他在高远目标之下，如昼方旦，无论广大与精微，无所不究的学习态度。

至元十二年(1275)，南宋灭亡已成定局前夕，元世祖“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萧郁，持诏召嗣汉四十代天师张宗演赴阙”。[②] 据忽必烈自云，江西龙虎山正一教宗师张宗演的父亲张可大曾预言：他将于二十年后实现天下大一统，而眼前“神仙之言验于今矣”，因此忽必烈特命张宗演主领江南道教。[③] 这昭示着江西龙虎山玄教即将在元代获得超然而崇高的宗教地位。1276 年前后，当天下大变，“政教未舒，民疑未附”之际，吴澄遁入山中，“作《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大小戴记》”。[④] 至元二十三年(1286)，吴澄的同学程钜夫，以集贤直学士再拜侍御史，奉元世祖忽必烈之旨前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此次程钜夫江南访贤的诏书，忽必烈特用汉字书写，显示出北廷向南方士大夫所释放出的诚意与态度。所以，程钜夫此行对于元代南方文人大举北上的风潮影响深远[⑤]。在程钜夫的“江南访贤”行程中，他特意到江西，强请吴澄北上。吴澄虽未接受程钜夫北上任官的请求，却跟随程钜夫一同前往京师。途中，吴澄与程钜夫江南访贤揽至的赵孟頫相识，到达京师后，吴澄又与北方优秀文人如阎复、卢挚等人皆有唱酬。由于这次北行，吴澄对大一统元朝的立场和出仕态度逐渐明朗。吴澄在《题程侍御远斋记后》中写道“子之爱亲，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无所逃于天地间”“余既从公观光于上国，又将从公而南。与公同其乐而不同其忧者，思有以纾光(公)之忧焉”，[⑥]这所谓“思有以纾公之忧”的表述，已经颇为坦诚平易地表明，吴澄愿意侍元朝之君，与程钜夫分担人臣之忧。而细核程钜夫江南访贤前的上疏，则吴澄的“纾公之忧”更可以解读为，吴澄将努力和程钜夫一起推动元代南方与北廷的融入进程。吴澄对元廷的接受态度也推动了他的学术著述进入官学。至元二十五年(1288)，在程钜夫的建言下，吴澄校定的《易》《诗》《书》《春秋》《仪礼》《大戴记》《小戴记》等著被有司缮录而进入国子监，供包括蒙古、色目及汉人贵族等多族群的师生传习。

作为“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吴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对《五经》的探研。在他的努力下，完成了《五经》由汉唐的典制训诂转入宋元的义理疏注过程，这确是“朱子门人所不及”，也的确不愧朱子继统之担当。《五经》中，吴澄对《礼记》用力尤深，“研精覃思”，“凡数易稿”[⑦]，直至 1333 年去世的当年，才与学生门人手校付刻《礼记纂言》。

关于《礼记纂言原序》的撰述意义，吴澄序言表述道：

> 《小戴记》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汉兴，得先儒所记《礼书》二百余篇，大戴氏删合为八十五，小戴氏又损益为四十三，《曲礼》、《檀弓》、《杂记》分上、下。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从而为之注，总四十九篇。精粗杂记，靡所不有。秦火之余，区区掇拾，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虽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往往赖之而存。[⑧]

《礼记》与有“大戴”之称的戴德、“小戴”之称的戴圣有密切关系。南宋王应麟指出：“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⑨]吴澄也认为“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基本依赖《大小戴记》保存。吴澄对《礼记》研究的重视，不仅因为他的时代所见到的《礼记》内容“多是记者旁搜博采，剿取残编断简荟萃成篇，无复铨次，读

---

①[元]吴澄：《答程教讲义》附录《程若庸劄子》，《吴文正公外集》卷三，《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 4 册，第 146 页。

②按：《元史》卷八记张宗演为正一教第四十代天师，误，当为第三十六代，《元史·释老传》亦记为第三十六代。见《元史》卷八、卷九《世祖本纪五》《世祖本纪六》，第 1 册，第 166、182 页。

③[明]宋濂等：《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第 15 册，第 4526 页。

④[元]揭傒斯：《大元敕赐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吴公神道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28 册，第 506 页。

⑤邱江宁：《程钜夫与元代文坛的南北融合》，《文学遗产》2013 年第 6 期。

⑥[元]吴澄：《题程侍御远斋记后》，《吴澄集》，第 3 册，第 1064 页。

⑦[元]吴尚志：《礼记纂言后序》，《全元文》，第 52 册，第 476 页。

⑧[元]吴澄：《三礼叙录》，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14 册，第 437 页。

⑨[南宋]王应麟著，李逸安、张立敏译注：《三字经》，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2 页。

者每病其杂乱而无章”①，极号难治；更因为朱熹非常重视三礼，却终老不及为，朱熹的学生黄榦、杨复虽曾用力于三礼，却也未能完成。更可能的时代原因还在于，两宋与辽、夏、金数百年的纷争割裂局面终于在蒙古人的整合下实现大一统，而且蒙古人对于多元族群与文化的共处情形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是“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②，所有族群可以按照自己本族群的信仰、风俗行事，这对于自汉以来即享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具有极大的冲击影响。作为儒家经典，《礼记》在汉末独立成书，至唐代，国家设科取士，将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被列为大经，而“三礼”中篇幅五万字的《仪礼》《周礼》则与《诗经》等被列为中经。《礼记》在唐代被列为大经的背景，迅速推动了《礼记》取得经典地位的进程。事实上，由于《礼记》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礼仪的细节，更由于它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所以《礼记》作为透彻地宣扬出儒家礼治中心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与《论语》《孟子》具有同等的地位。

吴澄的《礼记纂言》，在完成过程中“证之以经，裁之以礼。于经无据，于礼不合者，则阙之”③，吴澄之作从经学出发，围绕经学来全面注释和论证、规整《礼记》的内容，凡在经文中没有依据，且不合于礼的内容，则缺略不录。虞集认为吴澄的《礼记纂言》，秉承朱熹的治经思路，“既取诸义附于经”，将《礼记》的内容篇章按照经义的内容重新分类编排；“又别《大学》《中庸》别为一书”，④ 将《大学》《中庸》二书摘出《礼记》，吴澄认为“《大学》《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论语》《孟子》并而为四书，固不容复厕之礼篇。”⑤ 吴澄编撰的《礼记》内容凡三十六篇，篇次先后与之前的《礼记》内容颇有变动，每篇之中，又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同时又根据文章的上下文意，结合所属章节的主旨，在文章的左边标识出来，所以《礼记纂言》在虞集看来“篇章文句，秩然有伦，先后始终，至为精密”，⑥四库馆臣也认为“其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⑦与以往的《礼记》注释相比，吴澄的《礼记纂言》强调了它对经义的严格归属意味，与此同时，又加强了它的内容注疏和主旨提点，这应该更利于推广教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史》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然自朝仪既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至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⑧，高度评价和认可元代礼学的成绩与努力。四库馆臣亦评述元代《礼记》之学云：“延祐科举之制，《易》《书》《诗》《春秋》皆以宋儒新说与古注疏相参，惟《礼记》则专用古注疏。盖其时老师宿儒，犹有存者，知礼不可以空言解也”⑨，吴澄在其中的意义与努力不言而喻。

至大元年(1308)，元廷再次以从仕郎、国子监丞召吴澄，这一年吴澄60岁，却毅然接受了征辟，其深衷大意或许如江西士绅代表刘岳申所云“使先生以道教胄子，他日出宰大藩与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门。是犹先生之志得而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先生不宜卑小官以弃斯道斯民之福也”。⑩在以刘岳申为代表的南方士绅看来，吴澄有机会任职国子监，用儒家典籍教育蒙古、色目贵族的子弟，此后出任国家要职的人员便都出自吴澄门下，这意味着吴澄可以由此实现自己“以尧舜其君民”的绍续道统志向，这是吴澄愿意委屈自己而造福天下万民的高尚行为。

吴澄之前，国子监主要由金源文人把持，其教学路径，“遵衡(许衡)之旧”，颇为注重洒扫应对、言语训释式的小学教法；至大四年(1311)，吴澄到任后，推重“明体达用之学”，并吸收北宋程颢《学校奏疏》、南宋胡安国《大学教法》以及朱熹《学校贡举私议》等著作内容加以斟酌取舍，提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的教改体系，期望国子监的弟子员能在习读经学的基础上，进行儒家道德的实践；与此同时，在不放弃文艺表达训练的同时，令弟子员学习和掌握社会多元领域的广泛知识。

应该说，吴澄的教改体系是基于儒家思想教学的同时，又考虑到元代社会现状而提出的较为综合完善

---

①⑤[元]吴澄：《三礼叙录》，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4册，第437页，第438页。

②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17页。

③[元]吴尚志：《礼记纂言后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2册，第476页。

④⑥[元]虞集：《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张颐点校：《虞集全集》，下册，第866页，第866页。

⑦⑨[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0页，第170页。

⑧[明]宋濂等：《元史》卷六七《礼乐志》，第6册，第1664页。

⑩[元]刘岳申：《送吴草庐赴国子监丞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1册，第416页。

的教学体系，比许衡的教学体系要更为饱满丰富，更具有实践意义。另外，许衡的时代尚处于儒家学说在元朝推行的初期阶段，因此，许衡的教学强调朱熹的经义训释理念，从形式上要求弟子员“勤之以洒扫、应对，以折其外，严之以出入、游息，而养其中。掇忠孝之大纲，以立其本，发礼法之微权，以通其用”，他的教学努力在于如何使蒙古统治阶层明白汉法区别于回回法的意义和价值；到吴澄的时代，国子监的教学走向如何推进儒家学说深入的阶段，所以吴澄的教学追求“辩传注之得失，而达群经之会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极先圣之阃奥。推鬼神之用，以穷物理之变，察天人之际，以知经纶之本”，[①]致力于体系完备地传播儒家思想。虞集认为，许衡与吴澄只存在“时与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后者”的形势差异，而所传播的圣贤之道并无差异。[②]

需要看到的是，从江南正一教的受诏、程钜夫的江南访贤到赵孟頫的出仕并迅速产生“学者澜倒”[③]的文化影响以及吴澄任职国子监等等事件的贯连发生，其实相当程度地推进了南宋治下的士大夫北进的历程。而南方士大夫北进的潮流，直接且明显地影响到了元初凭借先入优势而把持朝中文化资源的金源文人群体的利益。南、北文人群体的冲突，最终在国子监中，以许衡门人对吴澄的攻击而公开化，导致时任国子司业的吴澄愤而辞职。据时人的描述和评价，许衡门人援引吴澄对弟子说过的话，“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并据此攻击吴澄“为陆氏之学，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吴澄无法辩白，只得“一夕谢去”。[④]而元朝国子监的这场争执也使得吴澄乃至元朝士大夫的学术性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吴澄到底是朱学正宗还是“朱陆和会”的推动者？所谓“和会朱陆”，是指把朱熹“格物致知”的笃实工夫与陆九渊“发明本心”的路径方法结合起来的倾向。[⑤]《宋元学案》认为吴澄的思想体系应该属于“朱陆和会”，其评论云：“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⑥]由评论之意，吴澄学说由饶鲁而来，饶鲁乃朱学正宗，但他的学说已有“朱陆和会”的萌芽。而吴澄的老师程绍开主持道一书院，其教学基本主张和会朱、陆二家。吴澄在《送陈洪范序》中也指出，朱、陆之学在由读书讲学而至真知实践的教学理路上是一致的：

> 夫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读书讲学；陆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实践。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而入。二师之为教一也。[⑦]

站在儒家发展的立场上，吴澄非常不满朱、陆二家的那些各自标榜，互相诋訾的庸劣门人，他认为这些人在致使学者犹疑迷惑的同时，更阻碍了儒家之道的传播。吴澄认为，儒家学说的传播发展应该走“朱陆和会”的路径，当“以朱子所训释之《四书》，朝暮昼夜，不懈不辍，玩绎其文，探索其义”，在“文义既通”的前提下，将真知付诸实践，按陆子之法“反求诸我。书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实用其力”。对儒家学说的探究与推进，应该是“明之于心，诚之于身”，二者皆不可偏废，不能只是“读诵讲说其文辞义理而已”，这是吴澄“朱陆和会”的真切意旨。吴澄认为“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陆子之所以教也。然则其要安在？外貌必庄，中心必一”，如果不由读书讲学获得真知，又怎么可能以真知去进行实践，最终求得明体达用的结果呢！[⑧]尽管吴澄在国子监的教学改革以他辞职而显示他失败为表象，但实际上，在吴澄辞职的当时便有国子监的弟子员“不谒告而从之南者”，[⑨]之后更在他著书立教的作用和影响下，“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这也意味着，元代学术的整体面貌应该是吴澄影响下的“朱陆和会”倾向。

---

①②[元]虞集：《送李扩序》，王颋点校：《虞集全集》，上册，第539页，第539页。

③[元]虞集：《跋朱侯所临智永千文》，王颋点校：《虞集全集》，上册，第406页。

④[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第13册，第4012页。

⑤邱江宁：《元代草庐文人与他们的文学时代》，《武汉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⑥[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首，第17页。

⑦⑧[元]吴澄：《送陈洪范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4册，第141-142页。

⑨[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第13册，第4012页。

三、吴澄与元代文学“变化气质”的创作追求

在现有的关于元代文学创作面貌的评价中，人们基本接受《元史》的判断，认为：元代文学与经学合为一体，不可分而为二，“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专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与之前所有的一统王朝相比，儒家学说缺乏独尊的地位，以及“百汉人之言，不如一西域人之言”的话语边缘地位，使得元代正统作者尤其注重文以载道，期望以儒家之道变化包括蒙古、色目为主体的统治阶层在内的多族群人们的气质。文以载道与变化气质，在元代作者的文章追求中，前所未有地一致。吴澄一生著有文集“裒然盈百卷”，创作上“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文章“尤彬彬”乎盛，[①]而其同学程钜夫，朋友赵孟頫，学生虞集、元明善、苏天爵、危素等都是元朝各个阶段的文坛宗主，他们在文以载道与文章变化气质的创作追求中，都意义突出，所以，《元史》认为，“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凡真正以文通显于世者皆为“通经能文”者。[②]

“变化气质”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乃一以贯之的追求，《周易》“革”卦载：

>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
>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③]

“九五”乃至尊之位，所对应之“大人”即君王，“上六”之位，君子与小人同处。虎变，其文疏炳而明，意思是君王实行变革，就像老虎换身新毛一样，明白而显耀；豹变，其文密蔚而理，意谓君子实现变革，就像豹子换新毛一般，多彩而醒目，小人之变，在于变化外观与面貌。北宋张载认为“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不尔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④]学问探究的意义就在于变化气质，如不能变化气质，则不能真正理解圣贤的言论以及他们的行为。朱熹在张载的基础上，特别指出《大学》“变化气质”的重要意义云：

>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⑤]

朱熹指出，天生万民，万民天性中本来具有仁义礼智的内涵，但他们的气质禀赋并不相同，所以必须有聪明睿智之君长、师父规训和教导之，以恢复生民仁义礼智之本，这个过程必须绵密细致，有聪明之君，以及司徒、典乐之官，共同承担起教育、变化生民之气质的重任。

文人士大夫变化天下生民气质的使命感，在多元文明并存且儒家思想不为统治阶层所了解和重视的元朝尤其突出。这一点，吴澄与赵孟頫二人更是惺惺相惜、志同道合。如前所揭，1286 年，吴澄接受程钜夫邀请前往元大都，途中于维扬驿邂逅赵孟頫，之后在京师中，“每日相聚”[⑥]。次年(1287)，吴澄南归，阎复、赵孟頫等卿士大夫前来送行，赵孟頫和吴澄更在饯别的唱和中互表北来的心迹与态度。赵孟頫书陶渊明的诗以及朱熹的诗以赠，在《送吴幼清南还序》中，赵孟頫认为学者的初心即在于“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⑦]吴澄亦在《别赵子昂序(并诗)》中认为赵孟頫能够做到“心不挫于物，所养者完，其学又知通经为

---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428 页。

②[明]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第 14 册，第 4313 页。

③[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五“革”，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125 页。

④[清]黄宗羲著：《宋元学案》卷一八《横渠理窟》，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757 页。

⑤[南宋]朱熹：《大学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 页。

⑥[元]吴澄：《跋子昂楷书后》，《吴澄集》，第 1259 页。

⑦[元]赵孟頫：《送吴幼清南还序》，钱伟强校注：《赵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70 页。

本”，认为赵孟頫内心坚韧，不为外物所搅扰，而所受到的教养又完备齐整，所学又以通晓经义为本，所以赵孟頫的识见才能“夐出流俗之表”[①]，能将圣贤的思想精髓流被天下，令天下生民由学问之习得而变化气质。

吴澄认为探求学问最大的意义就是变化气质，“所贵乎学者，以其能变化气质也。学而不足以变气质，何以学为哉？”[②]赵孟頫也非常认同“学问变化气质”的意义。他在《薛昂夫诗集序》中指出，薛昂夫作为西戎贵种，其气质本来具有“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的特征，在刘辰翁的指授熏染之下，变化气质，一变而“事笔砚，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发而为诗、乐府，皆激越慷慨，流丽闲婉，或累世为儒者有所不及”。赵孟頫由此而深发感慨云：

> 夫词章之于世，不为无所益，今之诗犹古之诗也。苟为无补，则圣人何取焉！繇是可以观民风，可以观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其博如此。嗟乎！吾读昂夫之诗，知问学之变化气质为不诬矣。他日昂夫为学日深，德日进，道义之味，渊乎见于词章之间，则余爱之敬之，又岂止于是哉！[③]

赵孟頫认为今日作诗之意义犹如古时，应该有益于世，如果不能帮助人们在观民风世道、知人情识事物的阅历和学问中变化其气质，则没有意义。在赵孟頫看来，薛昂夫以西域贵胄，其诗歌创作的意义实现了问学变化气质的意义，其词章之间闪现着儒家之道的深切内涵，这才是其创作令他爱之、敬之的真正原因。

如赵孟頫所喟叹，薛昂夫之类“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的游牧贵族，在元代却成为掌控大一统王朝所有资源的、《周易》所谓的“大人”，他们的人格气质与儒家思想所追求的目的相距甚远，试图推动他们的“虎变”是包括吴澄等整个元代士大夫的难题和宿命所在。在此，吴澄的意义又颇有突显。1324 年，76 岁高龄的吴澄被授命为首任经筵官。需要解释的是，在此之前，1323 年八月，御史铁失发动“南坡之变”，弑杀元英宗于上都，晋王也孙铁木儿被拥立为帝，是为泰定帝。泰定帝汉化程度较低，但又迫切期望身份获得认同，强调自己与之前即位的所有皇帝一样，同是忽必烈的子孙。为此，泰定帝在制定治国方略时，特别强调自己将祖述圣明之迹，以世祖规模为范。也正是在这层心理的影响下，泰定一朝肇开经筵制度，吴澄即因此首获此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元朝以蒙古语为国语，汉语第一次退出官方话语的地位，成为众多族群语言之一种，所以，与前朝经筵讲读最为不同的是，元代的经筵讲读是汉人精英选取儒家“经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④]可以说，元代经筵活动的本质是儒家典籍的传译。现今留存的吴澄经筵讲稿有两篇，《帝范・君德》尤其著名，例如下文：

> 唐太宗是唐家很好底皇帝，为教太子底上头，自己撰造这一件文书，说着做皇帝底体面，为头儿说做皇帝法度，这是爱惜百姓最紧要勾当。
>
> 夫民乃国之本，国乃君之体。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圆明而普照。
>
> 国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着天下，要似山岳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里都照见。
>
> 兆庶之所瞻望，天下之所归仰。
>
> 有做着皇帝，天下百姓看着，都随顺着。行的好勾当呵，天下百姓心里很快乐；有行的勾当不停当呵，天下百姓失望一般。[⑤]

引文中，楷体书写者为吴澄的经讲文，仿宋书写者为《帝范・君德》原文。通过吴澄的讲稿可以知道，他力图训导泰定帝明白做帝王的体统与规矩。例如文中“体面”一词就非常能见出吴澄以“学问变化气质”的努力。“体面”一词，就其本意而言，本是联合结构，指体态和脸，“体”，《广雅・释畜》：“体，身也”；“面”，《说文解字・面部》：“面，颜前也。”最早将“体面”作为联合结构使用的是唐代张九龄《上姚令公书》：“初则许之以死殉，体面俱柔；终乃背之而饱飞，身名已遂”；[⑥]元代康进之《李逵负荆》中有“〔学究云〕你只看聚义两个

---

①[元]吴澄：《别赵子昂序(并诗)》，方旭东、光洁点校：《吴澄集》，第 525 页。

②[元]吴澄：《送方元质学正序》，方旭东、光洁点校：《吴澄集》，第 576 页。

③[元]赵孟頫：《薛昂夫诗集序》，钱伟强校注：《赵孟頫集》，第 174 页。

④[元]赵汸：《邵庵先生虞公行状》，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54 册，第 358 页。

⑤[元]吴澄：《帝范・君德》，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14 册，第 59-60 页。

⑥[唐]张九龄：《上姚令公书》，[明]郭棐编撰，[清]陈兰芝增辑，王元林点校：《岭海名胜记增辑点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 年，第 876 页。

字。不要因这小忿。坏了大体面”，①“体面”则是作为复合词，指体统、规矩，②吴澄的讲稿第一次创造性地将“帝王之道”转换成生动直观且鲜活的操作性表述，叫做“做皇帝底体面”，既切合泰定帝的内在述求，又是“学问变化气质”的生动文体表达。这种语言转换能力，表面看去是文言与口语的转换，实质是体道、行道与言道的接轨。所以，虞集代表官方评价吴澄的学问，认为，他能够广泛考察万事万物的发展轨迹，进而推演、通晓圣贤言论所包含的深邃内涵，再能将思想上的深刻观察，践履于行为的最微小细节，从而做到知行合一、言与思相通，口传与心授相合，所谓“博考于训诂事物之赜，而推达乎圣贤之蕴；致察于思惟践履之微，而充极乎神化之妙。正学真传，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标表以盗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③ 通过吴澄的这则经筵讲稿，可以约略体会到吴澄在“学问变化气质”的理念指导下，其学问之精深与表达之神妙，亦可以想见吴澄令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的影响情形。而基于吴澄的这则表达案例，以及虞集作为一代文坛宗主和馆阁文臣的代表，他对吴澄评价中所包含的元代作者在创作表达中所期望实现的追求所在。

综上，吴澄既身处波澜壮阔、多元文明碰撞冲突的大元王朝，又年高寿长，一生数次被元廷启用，往返于京师与地方之间，所接触之人，上至帝王将相，中接达人君子，下及乡隅村老；所寓目之著述、事物、山川风景，遍及南北。而吴澄的见闻及文化学术意义与时代之风声气习息息相关，如虞集所谓，元朝“未丧斯文”是因“笃生先生”，吴澄之生元朝，是元朝之大幸。所以“公之存也，自南自北皆知悦服；公之殁也，识与不识皆为号咷”，④吴澄卒后，封谥号曰文正，危素在吴澄的年谱中解释云：“谥法：经天纬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这个评价不仅精确到位地概括了吴澄一生之于元代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时代意义，更深切地表明，如果元朝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典型且独特的王朝的话，那么吴澄在传统思想史、文化史中的独特而深切的影响亦不应被忽略和堙没。

“The Continuity of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the Epochal Significance of Wu Cheng

QIU Jiang-n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Yuan Dynasty,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the northern nomadic people, was a unified dynasty with a prominent feature of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China. The period in which Wu Cheng lived was precisely an important time when the Mongol ruling class was establishing itself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with Han culture. Although he entered the civil services relatively late, Wu Cheng took advantage of the era by traveling to big cities and exerting all his knowledge in writing and teaching. With his profound knowledge and a long life, Wu Cheng devoted himself to “magnifying the supreme truth and embellishing the great undertaking”. Under his influence, scholars from various ethnic groups across the country came to him. Consequently, not only was his academic thought clarified and spread far and deep but also the Cheng-Zhu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Zhu Xi’s and Lu Jiuyuan’s thoughts”, became the spiritual sustenance for scholars in the Yuan Dynasty. Eventually, the Yuan Dynasty witnessed “the success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continuity of Chinese scholarship.

Key words: the continuity of Chinese scholarship; Wu Cheng; the Yuan Dynasty; ideological field; multi-ethnic groups

[责任编辑　唐音]

①[元]康进之：《李逵负荆》第四折，[明]戚懋循：《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册，第1530页。

②《汉语大词典》“体面”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12册，第415页；又参考姜雪：《元代直讲体文献词汇研究》，内蒙古大学2023级汉语言文字学硕士论文。

③[元]虞集：《代中书平章政事张珪辞职表》，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6册，第33-34页。

④[元]刘岳申：《祭草庐先生吴公文》，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1册，第672页。